

基于双墩刻画符号的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研究*

吕春瑾¹ 王吉怀²

(1. 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 蚌埠市 2330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710)

关键词: 双墩刻画符号; 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 衍象摹形

摘要: 象思维的发展是文字萌发的内在动力, 文字的起源始于文的出现, 经衍象摹形的过程, 最终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双墩刻画符号是七千多年前先民取象比类, 刻画成文的珍贵记录。双墩刻画符号未必记录语言, 尚处于文的阶段, 而不是字的阶段, 其中蕴藏着汉字和易道思想共同的基因——象。由文到字的衍象摹形过程中, 指事与象形皆遵从书的共法——象, 指事象大类, 象形象小类, 指事先于象形,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观物取象, 即象思维下类的认知, 我们称为原象认知。是一种道性认知, 中华道性文化即萌蘖于此。

Key words: carved symbols of Shuangdun sit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glyph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thinking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germination.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begins in the appearance of character. Glyph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e, and the glyphs develop with the formation of images. Finally, they develop into a rounded character system. The pottery marks found at Shuangdun Site are the valuable records made by our ancestors by embodying the impression of the objective figures in their minds into the incised marks. These marks we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graphs rather than writings, and they might not be the notes of languages, but they implicated the common gen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aoist thought and the Classic of Changes, which was the "imit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from graphs to the writings, the ideograms and pictograms were all created following the common principle of "imitation"; ideograms were imitating broader meanings and pictograms were imitating narrower meanings, and ideograms were developed prior to pictograms, the logic of which matched the real history. Recording impressions of the observed objects, which was the cognition of the meanings under the image thinking, we named it as "proto-imitation". It is a metaphysical cognition and the root of the Chinese Taoist thought.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1.011

一、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的提出

(一)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三个维度

中国文字起源问题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课题, 需要全面探索和系统研究。课题在逻辑上包含三个维度: 一、中国文字萌发的动力是什么、形成的过程如何、开端与结束的标志, 这是时间维度的研究; 二、中国文字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元发生、单一起

源的地理位置及影响因素, 或多元发生的分布规律与相互关系, 这是空间维度的研究; 三、中国的文字起源与礼乐起源、国家起源之间有着何种联系, 这是社会维度的研究。因为礼乐、文字、国家的形成共同标志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成, 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所以三者关联性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尽管时间、空间、社会, 也即天、地、人三个维度的发现和讨论可以同时进

*本课题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资助, 项目号15YJCZH103。

行,然而要深刻揭示中国文字的起源,包括文字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必须依次从三个维度深化认识和研究。第一个维度思考中国文字如何起源,即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探究文字起源在时间维度的规律。只有认识了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才能判断中国文字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元发生,进而探究文字起源在空间维度的规律。在把握文字起源时空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文字起源与礼乐起源、国家起源之间的联系,最终把握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规律。显然,若要系统地把握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第一维度时间维度,即中国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是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二) 文字生成机制与“内在机制”

何靖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著作。作者提出“文字生成机制”来阐释“从图画和符号发展为文字体系”的过程,进而分析整理了时间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来,空间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兼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字起源现象,并将这些材料系统地收摄到“文字生成机制”中进行阐释。以“文字生成机制”理论统领全书,对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时间、空间、社会三个维度都进行了细致地探讨,何先生为学界奉献了一部优秀的、创新之作。正如李圃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给予的评价:

“何靖君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所提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中国文字起源机制动力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把钥匙。”^[1]“文字生成机制”理论在这部系统论著中是统领全书的核心理论,说明了时间维度在中国文字起源系统研究的三个维度中,处于基础和关键的地位。书中“文字生成机制”概括了人类文字起源历经史前图画和符号、巫师文字、通行文字三个阶段,分别以信息传达、巫术

需要、贸易促成等为动力,体现了以社会发展观为指导的研究思路。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汉字隶变的发生,除了社会发展的推动之外,汉字自身的内在规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在信息传达、巫术需要、贸易促成这些来自文字外部的社会发展动力之下,一定也有某种文字起源的内在逻辑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国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即中国文字起源在时间维度的规律。

研究中国文字起源在时间维度的规律,首先要找到中国文字起源开端、结束的标志,然后探究中国文字萌发的动力、形成的过程,从而揭示中国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起源的开始、萌发的动力、形成的过程、起源的完成,这些文字起源时间维度的关键问题之间,应当具有某种内在连贯的理路。任何不具备内在连贯理路的阐释都是自相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也不可能发现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的真相。包括刻划符号在内,关于中国文字起源开端的说法,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种:源于结绳、始于八卦、源于图画、源于数字、源于刻符,以及多源头混合说。这几种说法探讨了中国文字的前形态如何,并未指出文字萌发的动力是什么。中国文字是如何萌发的?以往主要有以下说法:圣人造字、源于巫术、源于劳动、源于贸易、文字西来等,近年还有学者指出文字生成背后有着多重动力,如何靖《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的信息传达、巫术需要、贸易促成等。在中国文字形成过程方面,一些学者联系近年考古资料重新阐释了古代六书理论。在中国文字起源的时间坐标上,开端与结束的标志应确定于何处?国内文字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主要是以“最早的文字”与“完整的文字体系”为判定标准。我国以往确认最早的“完整的文字体系”是距今

3300多年的殷墟甲骨文,因此学者多认为中国文字应产生于甲骨文之前。中国“最早的文字”究竟早到何时、具体形态是如何呢?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专家曾明确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舞阳贾湖龟甲契刻符号、蚌埠双墩陶器刻划符号等发现以后,有学者将中国文字起源的年代进一步前推至距今7000乃至8000年左右。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学界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史前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重要材料。

(三) 双墩刻画符号与文字起源研究

“刻划符号”,2011年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曾予以科学界定:“成熟文字体系出现之前或其早期阶段,刻划在陶质、石质等器物或山崖石壁上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几何形符号或象形符号。是研究文字起源的重要材料。”^[2]阅读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存在着“刻划符号”和“刻画符号”名称混用的情况。针对混用的情况,马保春和袁广阔专门撰文,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建议用‘刻画符号’。”^[3]笔者也曾较为随意地使用“刻划符号”,认真揣摩后发现:“刻划”与“刻画”确有不同意味,“刻画符号”一称更妥。“刻”与“划”两字义近,后字可省。将“刻”与“画”两字合用,更符合中国文字起源“书(书契、契刻)画同源”的实际。鉴于此,本文后面的相关表述均采用“刻画符号”。中国文字的源头应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各种器物上的刻画符号中去探究,对从刻画符号到殷墟甲骨文的数千年形成过程深入探讨。葛英会先生在《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一文中指出:“古代文字起源的研究,必须以起源阶段的原始资料为直接依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广袤土地上

大量发现的史前时期与初史阶段以陶器为主要载体,兼及龟骨、玉石等质料的刻画符号,已逐渐成为学术界有关文字起源研究中普遍关注的焦点。不断富积的原始刻画符号已成为破解文字起源之谜的关键所在。”^[4]近年来,随着史前刻画符号考古资料的涌现,一些文章把中国文字起源的年代不断往前推。然而在学术论证上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的争议:第一,史前的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第二,史前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汉字系统)起源关系何在?学术界有关史前刻画符号的争议已持续多年,且少有进展。尽管解开中国文字起源之谜的关键在于刻画符号的研究,然而囿于符号资料的限制、研究方法的局限,此项研究始终没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从刻画符号探究中国文字起源之谜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众多专家提出从双墩刻画符号入手。王昌燧、李学勤等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研究,可能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5]葛英会指出“双墩陶器所载的这批具象写实的象物、象事符号,为厘清与说明以往史前陶器符号研究中的各种争议与分歧,提出了可靠的依据。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字(汉字系统)的发展史将因这批符号的发现得到改写,并非是夸大其词,骇人听闻。只要我们对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略加回顾,双墩陶器符号的学术意义就会立即彰显出来。”双墩遗址,位于淮河中游的安徽省蚌埠市境内,是一处距今7300多年的单一的新石器时代台地遗址。遗址的三次发掘共发现了633件陶器刻画符号,是我国目前出土陶器刻画符号最多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双墩刻画符号在中国文字起源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学界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对于双墩刻画符号的认识,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主要表

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双墩刻画符号是否文字的争议，二是对双墩刻画符号用途的争议。双墩刻画符号的出土，让学界意识到中国文字的形成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同时，双墩刻画符号的研究，又让学者们在双墩陶符与中国文字的关联、中国文字的起源模式等问题上产生较大争议。对这些讨论和争议进行思考辨析，不难发现在双墩刻画符号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二、刻画符号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刻画符号研究中的两种文字观

对中国文字起源的内在机制进行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科学界定文字的概念，找到萌发、形成的标志，才能划定中国文字起源开端、结束的标志，进而分析文字的要素，然后考察诸要素如何形成，才能达成对中国文字萌发动力、形成过程的认识。为了厘清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基本概念，区分和检视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的两种文字观是十分必要的。文本位的文字观认为文与字既是文字的两个要素，又代表了中国文字形成的两个阶段：依类象形，物象之本，这是文的阶段。文未必有声，未必记录语言；形声相益，孳乳浸多，这是字的阶段。字音形兼备，对应语言。言本位文字观以记录语言或形声字的出现作为最早文字的标准，把文字体系形成的过程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出现量积累的过程。基于这种理解，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符往往被断定“既非汉字的源头，又不是汉字的分支，与汉字无直接发展关系。”^[6]如果我们以记录语言或形声字的出现作为最早文字的标准，实际上是在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先行切断了字与其源头——文的联系。以言本位文字观作为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研究前提，必然使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框定，很可能带来不符合中国文字起源事实的认识。在检视中国文字

起源研究中的文字观，厘清基本概念之后，我们联系史前刻画符号的实际来讨论^[7]。

（二）双墩刻画符号的多种分类情况

2008年出版的《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公布了559件刻画符号的摹本或拓本，对其他74件符号的形态进行了描述。已公布摹本或拓本的559件双墩符号中，7件符号刻画在豆圈座上，其余552件均刻画在圈足碗底，说明双墩先民对符号载体和刻画的位置有明确的选择。发掘报告从刻画符号载体、出土情况、保存情况、刻画方法以及符号类型等方面对双墩刻画符号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论述。报告依据符号的形体结构、形态及完整残缺情况将刻画划符号分为象形、几何和其他三类：第一类象形类符号分为动物形和植物形，如叶脉形、鱼形等，共计124件；第二类几何形符号分为三角形、方框形、半框形、十字形、网格形、数字形、圆圈形、弧线形、房屋形、叉形，共计292件，其中几何形符号有单线、重线与组合等多种构成方式；第三类其他类符号分为特殊形和残形：特殊形是既看不出像何种动、植物，不便列入象形类，又不能对应某类几何形状，难以归进几何类，共计32件。残形是载体陶片残损，不能做出符号完整形状的判断，故不能归属象形类或几何类，共计185件。由于特殊形和残形符号“形状不明确”，无法归入象形类或几何类，故单列为其他类^[8]。

除了发掘报告将双墩刻画符号划分为象形、几何形、特殊形和残形，还有学者采用其他的分类方式，如葛英会把双墩刻画符号分为象物符号、象事符号、其他符号（意义不明者也暂归此类）三类，象物符号分为动物、人工器物、建筑物、自然物、记数工具等；象事符号分为器具形与器具形的复合符号、器具形与鱼形复合符号、器具形与豕形

复合符号、其他意义不明符号等^[9]。王晖将双墩符号划分为肖物象形类、抽象几何形和“文字画”类型等,肖物象形类分为动物类、植物形、天体自然房屋方面;抽象几何形分为三角形、四边形与多边形符号,交叉线、网格、圆圈、弧线形图案,数字类符号^[10]。王蕴智从构形特征上将双墩符号分为象形、几何形和组合形等^[11]。牛清波把双墩符号分为象形类、几何类和其他类,其他类包含两类符号:一是由象形、几何符号组成的复合符号;二是符号残缺且不能据形复原的符号^[12]。何靖把双墩符号分为单体符号、组合符号和成组符号三类,其中单体符号又分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13]。此外,我们还考查研究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分类情况。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收录了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554件,其中陶器刻画符号536件,占总数的96.7%。536件陶器上共有符号632个。该书将这些符号分为象形符号、抽象符号与其他符号三大类,按照可辨识笔画的顺序,遵循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划分这数百件器物上的符号。其中,象形符号类下共有器物64件,符号91个,其中刻画单个符号的器物47件,刻画两个以上符号的器物17件;抽象类下共有器物425个件,符号489个,被分为:制陶工序的标记、所有权的标记、记事的标记等几类;其他符号类下共有器物47件,符号52个,因制作和戳刻位置特殊性而被命名为其他符号^[14]。

(三) 刻画符号分类中的认识论问题

双墩刻画符号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和界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分类方式和界定是在不同程度的“据形测义”前提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对双墩符号进行分类,是我们在既有知识(某些物的知识以及几何知识)的前提

下,将一些符号识别并解读为鱼、猪、三角形、圆圈形、叉形等,然后将这些识别出来的符号归属象形和几何形,将既有知识下不能识别的符号归属特殊形和残形。其实,对于这些符号的识别,同一观者从上下左右等不同视角审视,识别会大相径庭;不同观者所持有的既定知识不同,解读也会不同;就算各位观者持有共同的当代常识,解读的思路又会受当下共性常识的制约。因此,我们在认识双墩刻画符号、探究符号意义,并藉此理解文字起源的时候,容易忽略但又必须做的是:同时审视我们自身的认识方式,尽量避免在研究中把我们的认识强加给古人,造成今人、古人认知的混淆。

认知考古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霍德和本德指出:“认知考古学的对象是遗存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人类的行为,这是其本体论。除此之外,还要研究考古学者本身认识历史的能力和途径,即把认知考古学引入到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范畴。在这方面,他们都强调要注意区分当代的‘我们’与古代的‘他们’在对待具体事物时所存在的观念上的差别。”^[15]在双墩符号的研究中,必须尽量抛开和放下“我们”的认知,才有可能发现和理解“他们”的认知,感受和体会“他们”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也即“我们”曾经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从而如“他们”曾经洞见世界和自身的来源那样,重新发现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来源。以这样的方式去探究文字,让我们注意到文字的“起源”与“来源”是既不相同,又有紧密联系的两个问题:前者研究的是文字如何起源,是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后者研究的是文字创生之源,是文字起源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二者不仅是文字起源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对文字将来发展的认识和把握。

三、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的推断

(一) 象思维：人类思维的原点、文字萌发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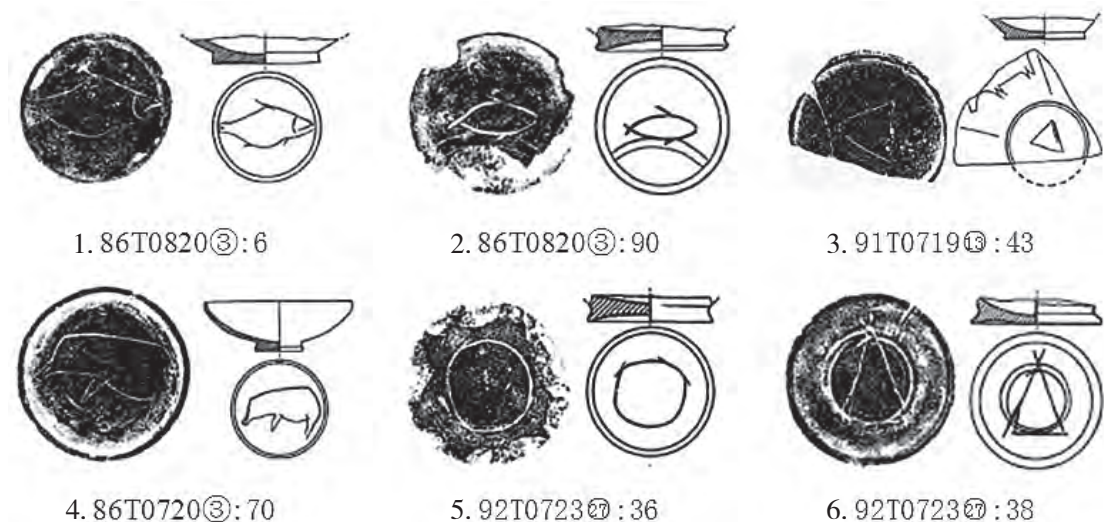
考虑到文字起源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论问题，我们暂且搁置各种不同程度的“据形测义”后的命名和分类，在尽量不识别和解读符号的前提下对符号重新考察和分类。前两类刻画符号，发掘报告以“象形类”“几何类”命名，前者是六书之称，后者是数学用语，此为常识习惯式表述，不能充分表达出两类的联系与区别。为了对这两类符号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使用“拟象”和“抽象”之名来分析探讨这两类符号。第三类，特殊形件和残形件，即形状不明确的185件其他符号，尽管无法辨明符号形状，不能归属象形类或几何类，但符号原本总是或拟象、或抽象的。因此，双墩刻画符号实际上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拟象、抽象两大类。

拟象类：第一类象形符号141件，如象鱼、象猪等，皆“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因某种动物、植物等的实物形体而勾画线条。比拟实物形象画成物象，即“拟诸形容”，如③是拟鱼之形，画成鱼类之象，④

是拟猪之容，画成猪类之象。我们称为拟象符号。

抽象类：第二类几何形符号275件，如三角形、圆圈形等。不是因实物形体画成具体物象，而是抽取物的一般共形，或事物的某种共性关系，划成抽象物象。抽取非实物之理划成物象，即“象其物宜”，如⑤是象三角式物宜，即三角模式的理（各种三角状或三角式事物关系、三边式运动轨迹等），划出三角式物象；⑥⑦象圆式物宜，即圆模式的理（各种圆状或圆式事物关系、周形运动轨迹等），划出圆形物象。这些刻画都是抽象物象的表达。

双墩刻画符号中，拟象类符号刻画的是拟形的物象，抽象类符号刻画的是抽理的物象，二者都是取象比类的记录，见图一。象者像也，取是提取，比谓比类，类是类别。取象比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也是最原初的认知方式，是人类基本和原初的思维。象，是思维的原点。双墩新石器遗址拟象类和抽象类符号都是7000多年前人类原初“象”思维的体现，基于这一共性，我们把两类符号合称为“原象符号”，这一命名也最大程度地规避了双墩刻画符号分类和命名



图一

中隐含的“据形测义”，从而尽可能地解决了文字起源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论问题。

（二）文——文字的源头

双墩遗址600余件“原象符号”是双墩先民仰观俯察，取象比类，刻画成文的珍贵记录，但尚无它们记录语言的证据。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部分双墩陶符进行释读，而且有些符号刻画生动，有呼之欲出之感，但每器只刻一符，缺少语境，实难断定陶符的音和义，无法得出释文的确切答案。对于古文字的考释，高明先生指出：“在一般情况下，所释之字上下皆有词义，释者必须将所释之字同上下词义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然后经广大学者分析决择，反复审核，从而正确的意见得以保存，错误的意见予以扬弃。陶符仅孤立一个，无上下词义可供辨识，只能从字体本身分析研究，这就需要格外慎重，切忌臆测。”^[16]双墩陶符符号孤立，显然不是“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因此，我们认为双墩陶符未必记录语言。

本文在前面讨论文字概念时已经指出，文与字既是文字的两个要素，又代表了中国文字形成的两个阶段：依类象形，物象之本，这是文的阶段。文未必有声，未必记录语言；形声相益，孳乳浸多，这是字的阶段。字音形兼备，对应语言。可见，7000多年前的双墩原象符号尚处于文的阶段，而不是字的阶段。文即纹理，就是物象的线条，物象中蕴涵着道理，象中又有数，象数理一体。因此，文，物象的线条——既是文字的源头，又是思想的源头。西方的认知考古学者也指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特征是能够使用‘象征’，人类的思想和语言都基于象征。”^[17]原象符号处于文的阶段，是文字和思想尚未分化的时期。随着象思维的发展，形声相益孳乳浸多，形成文字；象数义理发展成熟，传为易学。基于象思维的

文字——汉字，以“类万物之情”，基于象思维的科学——易学，以“见天下之赜”，二者皆有“通神明之德”的大用。唐玄度的《论十体书》也说：“颡有四目，通于神明，观察众象，而为古文”。作为人与神明沟通的渠道，汉字让万物的性情可以察识，易学使天下的变化不能隐藏。这是因为象之本体，是易，是变化之道，汉字与易象相表里。中国自古就有文字源于八卦之说，当代也有学者指出贾湖、双墩等远古刻画符号是“卦象文字”^[18]。原象符号中的象思维，一方面因其发展带来汉字和易学的分化，另一方面又将汉字和易学紧密地系于共同的文化基因。不过，易学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结合双墩原象符号的考察，探究象思维的发展与衍象孳字的过程，即由文到字的衍化途径。

（三）衍象孳字的过程

如前所述，双墩原象符号分拟象（象形）和抽象（几何）两大类。学界就这两类符号与汉字起源的关系展开了一些讨论。葛英会依据传统六书理论，认为双墩遗址象形类和几何类符号分别象物和象事，以象物符号为主，是中国汉字系统的远祖，以往被学界归于几何形的某些符号也是象物符号，由此，中国文字起源“指事先于象形说”“二元说”均不成立。王晖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类的刻画符号和图案，而非抽象类的刻画符号，基于这一认识，他推断双墩遗址拟象类符号（象形类及“文字画”类）是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是汉字的源头；抽象类符号（几何类）是“非文字性符号”，与汉字没关系。象形、几何两类符号与汉字起源的关系，学界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其一，象形类符号是象形文字的源头，符合汉字造字的六书理论，已经毋庸置疑；其二，几何类符号与汉字起源有没有关系，与

六书理论是否相应,尚存不同看法。由此可见,在双墩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问题上,抽象类符号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抽象类符号是否具有中国文字的性质?与六书理论是否相应?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象形”之衍。双墩遗址抽象类符号数量众多,说明刻画者已颇具抽象思维,这些符号是否具有中国文字的性质,是否与六书理论相应呢?回答这一问题,先要明确中国文字的性质并考察六书理论。汉字是象形文字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我们对此常识稍作反思,就会发现背后隐藏着“象形”一语的歧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这段话中“象形”出现了两次。仔细体会,这两处“象形”的用法和语义是不同的。第一处说,仓颉依类象形,是初作书,称之为文。比类取象,因象得形,形显成文,这是最初的书,原始的书。书者如也,谓形如其象。第二处说,六书之象形,谓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此处“形”为所画之物的形体,“象形”就是象所画之物的形体。可见,前一“象形”是形如其象,是书的根本方法,后一“象形”是象其形体,是书的六法之一。前义广而后义狭,后者由前者分化而来,是前者的一个

分支。所谓“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孙诒让《名原》)。

2. 六书次第。六书是造字之本,因象得形、形如其象是本中之本。许慎《说文》序言六书次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指事先于象形,正说明了六书之“象形”与初作书之“象形”所指不同。黄侃先生的《论文字制造之先后》在初作书之“象形”处注曰:“此象形兼指事而言,故《说文》于指事字,每曰象其事之形。”^[19]象其事之形即象事、指事。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象,是书的根本大法,是造字之本。形、事、意、声是所象的四个方面,无所谓先后次第。转注和假借则是在四象基础上孳乳浸多的途径。可见,初作书之“象形”统摄六书之象形、指事等。许慎与班固所言六书之名存在差异,这是由于六书系后人整理文字归纳所得之名称,是对已发展成熟的文字系统其成书原理的分类。不同的研究者多少会存在认识角度和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书者,如也,写也,如象而写形。六书即是汉字如象构形的六种方式。六书之次第说明了汉字起源衍象孳形的过程。

3. 指事与象形。将许慎与班固之六书次第进行对照分析,可知指事即象事,与象形遵从书的共法——象。从所象内容论,象事与象形是并列关系;从出现早晚上看,象事或早于象形。考察双墩刻画符号,可以证实这一推断。从发掘报告介绍的331件刻画符号来看,在形状明确的223件中,抽象物象的数量是具象物象的将近三倍。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中,动物、植物类符号也不占多数,象实物之形的符号数目远远小于“似是而非”的符号。这说明在人类思维发展的早期阶段,抽象思维的运用并非晚于具象思维,而

我们通常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是由具象到抽象的。双墩文化丰富的抽象符号,以及具象与抽象符号共存的现象,启发我们探究六书中象事与象形之关系,从而认识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本原。关于象事与象形的区别与联系,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形谓一物,事该众物”(《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象形与象事,皆为物象之写照,二者有专与博的不同。象形乃专拟一物之形容,象事则博采众物之事宜。相对来说,前者象小类,后者象大类;前者偏具象,后者偏抽象。双墩古人的观物取象,实际为象思维下的类的认知,我们称为原象认知。人类在原象认知阶段,尚未分化出对立的具象和抽象思维,如浑沌之未凿。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文字起源的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文的阶段未必有声,未必记录语言;字的阶段音形兼备,对应语言。如果我们以记录语言或形声字的出现作为最早文字的标准,实际上是在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先行切断了字与其源头——文的联系。文,是物象的线条,既是文字的源头,又是思想的源头。7000年前的双墩陶符是祖先取象比类,刻画成文的珍贵记录,我们称为原象符号,尚处于文的阶段,而不是字的阶段,其中潜藏着汉字和易道思想共同的文化基因——象思维。六书是造字之本。因象得形、形如其象是本中之本。六书之次第说明了汉字起源衍象孳形的过程。指事与象形皆遵从书的共法——象。从所象内容论,象事与象形是并列关系;从出现早晚上看,象事或早于象形。双墩古人的观物取象,实际为象思维下的类的认知,我们称为原象认知,是一种道性认知,中华道性文化即萌蘖于此。象思维的发展是中国文字萌发的内在动力,文字的起源

始于文的出现,经衍象孳形的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 [1] 何靖.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3.
- [2]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语言学名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
- [3] 马保春, 袁广阔. 试析中国早期器物刻画符号的命名问题. 中原文物, 2015, (6).
- [4] 葛英会. 古汉字与华夏文明.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9.
- [5] 王昌燧, 赵晓军. 双墩刻画符号: 中国文字的起源? 光明日报, 2003-07-16.
- [6] 高明著. 高明论著选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37.
- [7] 吕春瑾, 王吉怀著. 从双墩陶符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 第五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论文集,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58.
-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双墩.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84~272、320~398.
- [9] 拱玉书, 颜海英, 葛英会. 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22~127.
- [10] 王晖. 从蚌埠双墩遗址陶符看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6).
- [11] 王蕴智. 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 [12] 牛清波.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 2013年安徽大学博士论文.
- [13] 同[1]: 231.
- [14] 张炳火主编, 良渚博物院编著.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6~27.
- [15] [英] 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 考古学: 关键概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95.
- [16] 同[6]: 15.
- [17] 同[15]: 186.
- [18] 蔡运章, 张居中. 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 中原文物, 2003, (3).
- [19]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

(责任编辑: 方燕明)